

山西榆次大发旧石器地点

高 星 尤玉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吴 志 清

(山西省晋中行署文物工作站, 榆次 030600)

关键词 大发; 细石器; 更新世晚期

内 容 提 要

山西榆次大发旧石器地点, 属搬运埋藏类型, 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产自潇河右岸第二级阶地中部, 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期。该地点的文化遗物包括传统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石器类型和制作技术显示出与雁北地区的峙峪遗址和晋南的下川遗址有密切关系。该地点在晋中盆地的发现对连接、对比山西南、北旧石器晚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概 况

大发旧石器地点, 是吴志清根据参加修筑榆昔公路的民工提供的线索, 于 1980 年夏找到的。这一地点位于山西省榆次市以东 15 公里, 寿阳县西洛镇以西 1 公里的潇河右岸, 地理坐标为 $37^{\circ}40'30''N$; $112^{\circ}50'10''E$ (图 1)。吴志清曾对这一地点进行过数次发掘清理, 从第二级阶地中部含砾砂层中获得千余件石制品, 六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大量人工敲击的碎骨片。

潇河是汾河在晋中地段最重要的支流, 源于太行山, 谷底宽浅, 两岸基岩裸露, 中生代早三叠世的砂岩和上新世的三趾马红土多有分布。潇河两岸有三级不对称阶地, 如图 2 所示。第三级阶地在右岸表现为基座阶地, 阶面高出潇河水面 30 余米, 阶地基座为二马营统砂岩夹紫红色泥岩, 不整合面上为晚更新世早期堆积物, 由砂砾层和具三条古土壤的黄土组成, 其层位和物质组成与蓝田地区焦家湾组(张玉萍等, 1978)、襄汾丁村 100 地点(裴文中等, 1958)相当。顶面覆有马兰黄土。第二级阶地高出河水面约 10 米, 本文描述的文化遗物即出土于该阶地中部的含砾砂层中。第一级阶地高出河水面 2 米, 由砂砾层和表土组成, 时代为全新世。

含文化层的第二级阶地地层剖面从上至下依次为:

全新统

6. 次生黄土, 灰黄色, 无层理, 时见泥岩团块, 是晚更新世晚期马兰黄土经破坏后再堆积的产物, 厚 0.8—1.5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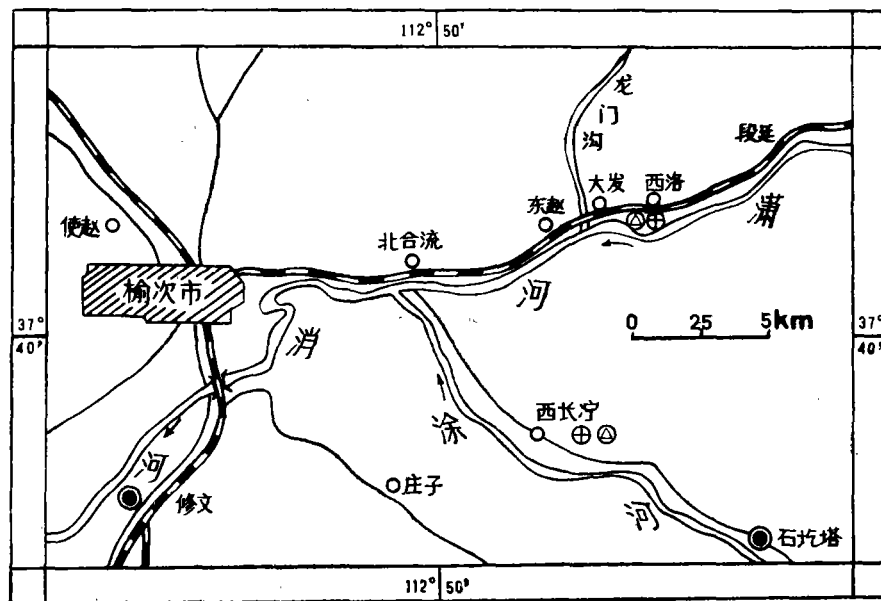


图 1 大发地点的地理位置
Geographic position of Dafa s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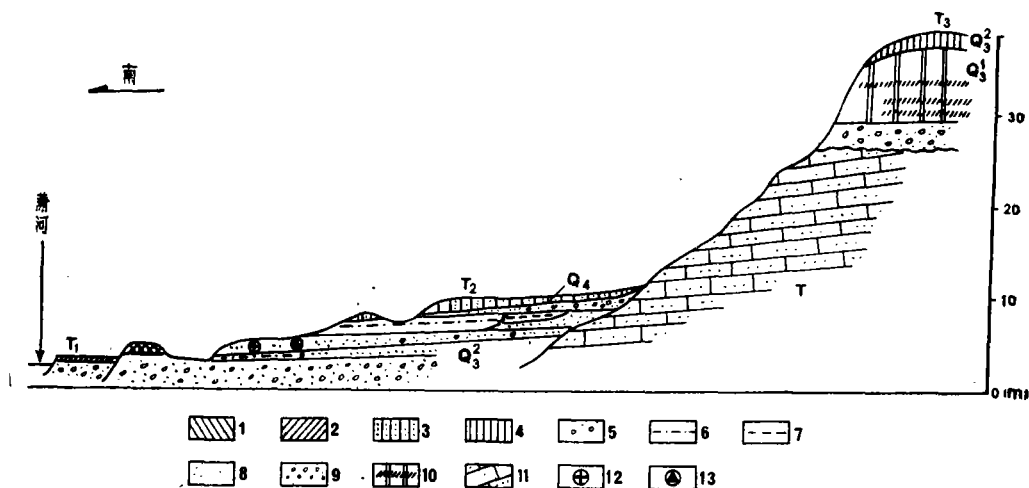


图 2 大发地点地层剖面图
Section of the deposits of Dafa site

1. 近代人工堆积; 2. 耕土; 3. 次生黄土; 4. 马兰黄土; 5. 含砾砂层; 6. 砂质粘土; 7. 粘土;
8. 砂层; 9. 砂砾层; 10. 含古土壤的黄土; 11. 砂岩; 12. 哺乳动物化石; 13. 石制品

晚更新统

5. 灰黄色砂砾层, 具层理, 砾石成份较杂, 属河流的边滩相沉积, 厚 1.2 米。
4. 淡紫红色砂质粘土, 夹细砂或粘土透镜体, 或呈过渡性质, 厚 1.5 米。
3. 含砾砂层, 灰白色, 砾石含量约占 10%, 成份较杂, 颗粒较小, 砂为中粒, 分选度中

等。本层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厚 0.8—1.3 米。

2. 淡紫红色砂质粘土、夹细砂透镜体,厚 0.4—0.8 米。

1. 灰白色砂砾层,未见底。

经鉴定,哺乳动物化石有:狼 (*Canis lupus*)、普氏野马 (*Equus przewalskyi*)、蒙古野驴 (*Equus hemionus*)、野猪 (*Sus scrofa*)、大角鹿 (*Megoloceros* sp.)、原始牛 (*Bos primigenius*) 6 种。这一哺乳动物组合的全部成员均是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更新世晚期的常见种类,其中前四种为现生种,后两种为绝灭种。根据与其他地点化石、地层的对比,可以认为,大发旧石器地点的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晚于峙峪遗址 (28,135±1330 BP),大致与阎家岗遗址 (22370±300 BP, 尤玉柱等, 1987)或大连古龙山遗址 (17,160±240 BP, 周信学等, 1990)相当。该动物组合反映偏冷的气候条件。

大发旧石器地点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出自河漫滩相的比较纯净的含砾砂层中,石制品稍有冲磨痕迹,哺乳动物化石或为单个牙齿,或为破碎肢骨,少见较完整的骨骼,显然这些文化遗物经历过水流的搬运、埋藏作用。故从埋藏学角度看,这一地点应为搬运埋藏类型(尤玉柱,1989)。

二、石 制 品

经过几次的发掘清理,在大发地点获得了丰富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器三大类。经初步整理,在千余件石制品中选取289件典型材料加以分类和记述。

1. 石核 10 件,包括锤击石核、砸击石核和细石核。

(1) 锤击石核 3 件,是指用石锤直接打击法剥片而产生的普通石核。原料全部为石英岩,个体很小,最大 43×38×35 (长×宽×厚,单位毫米,下同),最小仅 26×30×14。其中 1 件为单台面石核,自然台面,另 2 件为多台面石核。标本 SYP.0071,多台面石核,盘状,向两面交互打片,周身布满石片疤,长 35,宽 33 厚 19 (图 3,1)。

(2) 砸击石核 2 件,原料为黑色燧石,个体很小,两端皆有屑痕,但其中一端的屑疤更密而长,应为砸击着力点。标本 SYP.0112,在砸端的两面可见从砸击点向下延伸的长而浅平的石片疤,另一端亦有几个崩落的屑痕。长 28,宽 21,厚 14 (图 3,6)。

(3) 细石核 5 件,原料均为燧石,个体很小,最大 28×15×10,最小仅 19×10×9。其中 3 件为楔状石核,另 2 件为短柱状。标本 SYP.0001,系最大的一件,核体呈楔形,在工作面上可见数条平行的长而浅平的石叶疤 (图 3,3)。标本 SYP.0010,呈不规则的短柱状,在工作面上可见数条平行的石叶疤。长 19,宽 20,厚 10 (图 3,9)。标本 SYP.0022,楔状石核,长 22,宽 11,厚 3 (图 3,10)。在这些细石核上不见明显的打击点,石叶疤多浅长平行,半锥体阴痕微微凹入,应是采用了压制剥片技术。

2. 石片 共 265 件,是该地点石制品的主体。原料以燧石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和角页岩,并有少量脉石英和其它岩类。类型包括锤击石片,砸击石片和石叶。

(1) 锤击石片 249 件,是石片中最多的一类。形状多不规则,个体大多很小,小型石片占绝大多数。多数标本长大于宽或长宽相近。石片角最大 130°,最小 90°,平均为 108°。其中部分标本在锐利的边缘上有多处小疤,与一些文献中描述的“使用石片”很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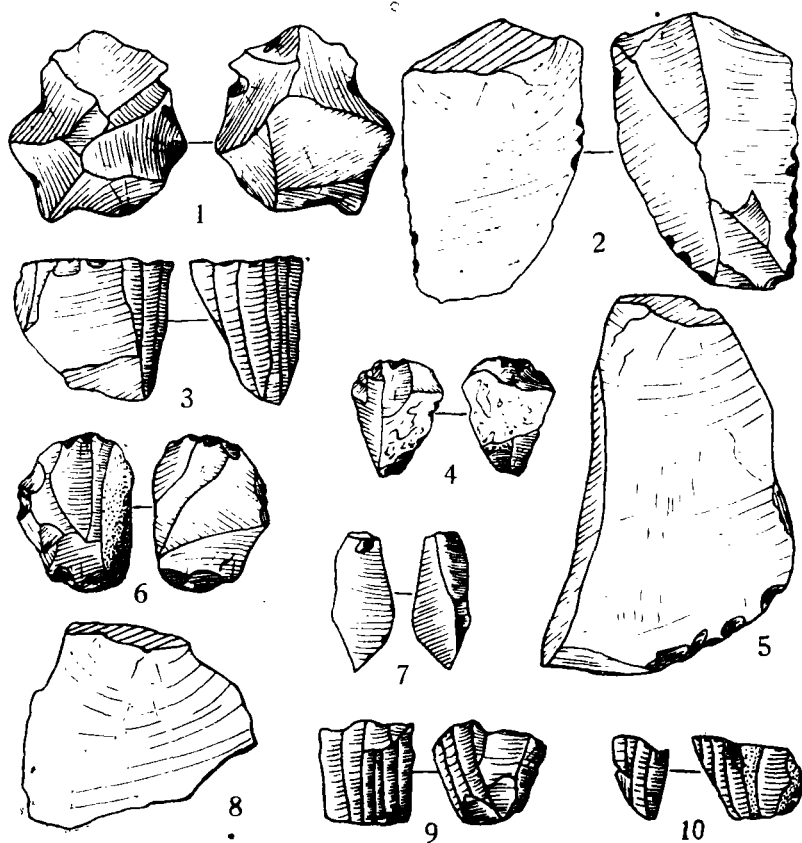


图3 大发地点的石核、石片和石叶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Dafa site

- 1.多台面石核 (Core with multiflatforms) 2,5,8.锤击石片 (Flakes) 3,9,10.细石核 (Microcores) 4.砸击石片 (Bipolar flake) 6.砸击石核 (Bipolar core) 7.石叶 (Microblades) (均原大)

近(裴文中等, 1958)。标本 SYP.0002, 系较大而规则的长型石片, 原料为角页岩, 有疤台面, 打击点不显, 半锥体大而微凸, 远端局部有小疤。长 72, 宽 45, 厚 13, 石片角 115° (图 3, 5)。标本 SYP.0004, 宽型石片, 原料为石英岩, 小素台面, 打击点不明显, 半锥体微凸。长 35, 宽 44, 厚 9, 石片角 104° (图 3, 8)。标本 SYP.0003, 较规则的长型石片, 原料为黑色燧石。其左侧边布满小疤, 细观呈锯齿状, 疑为未经加工而直接当作刮削器使用过 (图 3, 2)。

(2) 砸击石片 5 件, 在石片类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多数标本个体小, 呈长条状, 于一端或两端可见砸痕及崩落碎屑的痕迹。标本 SYP.0104, 两端石片, 原料为黑色燧石, 砸端呈刃状 (图 3, 4)。

(3) 石叶 6 件, 原料均为燧石, 个体很小呈薄长条状。台面小, 多不见明显的打击点, 亦常无明显的半锥体, 可能由压制法或间接打击法产生。标本 SYP. 0028, 形如柳叶, 断面三角形, 两侧与远端呈薄刃状, 尾端上翘, 长 25, 宽 11, 厚 3 (图 3, 7)。

3. 石器 14 件, 可分成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三类。

(1) 刮削器 9 件, 是该地点的主体器型。个体均很小, 绝大多数形状规则, 加工精细, 显示一种稳定而高度发展了的制作技术。这 9 件标本全部为单刃, 依刃缘的形态和刃口的位置分为直刃边刮器、凸刃边刮器和凸刃端刮器三种。

A. 直刃边刮器 1 件, 即标本 SYP.0007, 原料为石英岩, 毛坯为宽而薄的砸击石片, 向一面加工, 与刃口相对的一边亦做了修整以便于抓握。长 28, 宽 36, 厚 6, 重 9 克, 刃角 59° (图 4, 5)。

B. 凸刃边刮器 3 件, 其中 1 件用石英砂岩石片制成, 另 2 件系以燧石残片作毛坯。标本 SYP. 0011, 向一面加工出一段凸弧状刃口, 刃角 50° , 在另一段凹弧状薄锐的边缘上有多处连续宽短的小疤, 似乎是未经加工而直接使用的痕迹。长 25, 宽 17, 厚 5, 重 3.5 克 (图 4, 1)。标本 SYP. 0031, 毛坯呈扁平薄片状, 从平坦的一面向另一面单向加工, 刃口锋利, 呈规则的弧状; 修疤浅平而匀称, 不见打击加工痕迹, 显系压制修理所致。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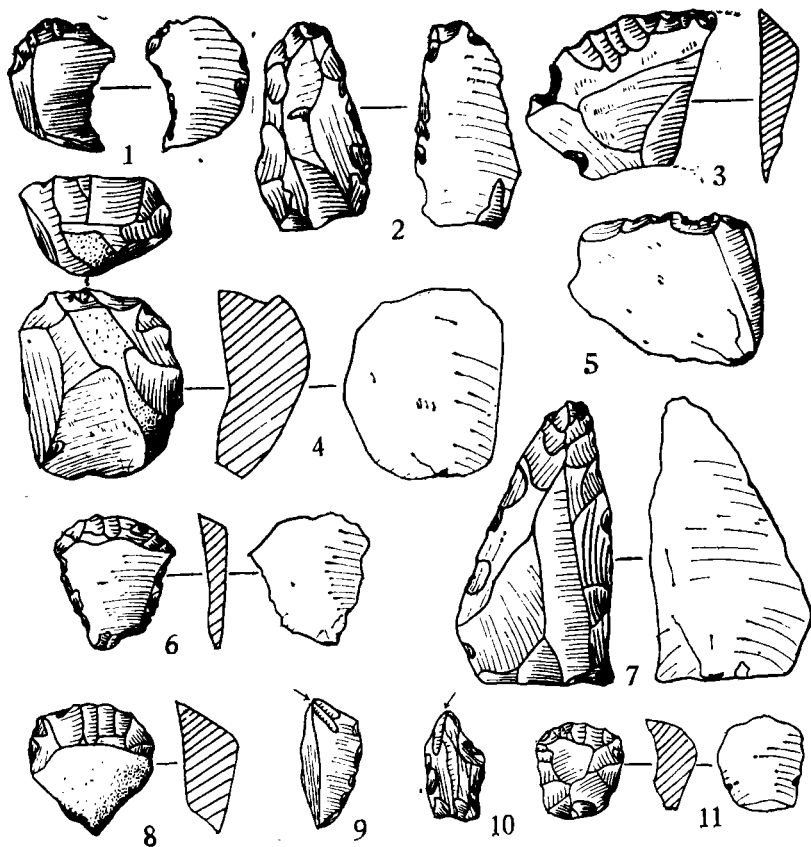


图 4 大发地点的石器

The stone tools from Dafa site

- 1, 3 凸刃边刮器 (Convex sidescrapers) 2, 7 尖状器 (Points) 4, 6, 8, 11 凸刃端刮器 (Convex end-scrapers) 5. 直刃边刮器 (Straight sidescraper) 9, 10 雕刻器 (Burins) (均原大)

28,宽 29,厚 6,重 8 克,刃角 50° (图 4,3)。该标本刃缘的一侧有一凹缺,另一侧纵向破裂而造成部分残缺。依现存痕迹推测,该石器原来可能呈较规则的半月形。若残缺的一半也有一个凹缺的话,那么它很象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的祖型。

C. 凸刃端刮器 5 件。除 1 件的原料为石英岩外,其余 4 件皆为燧石制品。其中 3 件的毛坯为石片,亦即将小石片的远端加工成圆弧状刃口;另 2 件用小石块制作。标本形体规整,刃口匀称,个体很小。最大 $35 \times 30 \times 17$,重 23 克,最小 $17 \times 16 \times 8$,重 3 克。全部采用正向加工。从形态观察,这几件器物与峙峪遗址出土的小圆头刮削器(贾兰坡等,1972)以及下川遗址中的短身圆头刮削器或指甲盖状刮削器(王建等,1978)很相似。标本 SYP.0012,扇状,器体很薄,长 25,宽 22,厚 5,重 3 克,刃角 57° 。该标本的两侧边亦做了修整,从加工痕迹散乱及边缘厚钝等情况看,对两侧边的加工应是为便于持握而进行的“钝台化”处理(图 4,6)。标本 SYP.0015,系该类器型中最大的一件,形如龟,器体很厚,宽厚指数达 86,是由远端向背面加工而成的,修疤浅平重叠。但由于毛坯远端中部很厚且质地不匀,致使加工过程中剥离的小石片中途折断,影响了进一步加工,亦使刃角变得很大(78°) (图 4,4)。标本 SYP.0008,近于扇形,由扁平宽厚的一端向一面平行剥落数条长薄的叶片,致使刃口规则锋利,修疤浅长平行而匀称,是一件加工得十分精致的石器。长 24,宽 24,厚 10,重 7 克,刃角 62° (图 4,8)。标本 SYP.0013,指甲盖状,系该类器物中最小的一件,器体规整,加工精细,刃角 69° (图 4,11)。上述几件标本刃口规则,修疤浅长匀一,不见明显的打击加工痕迹,应是采用了压制修理技术。

(2) 尖状器 3 件,皆为正尖尖状器。尖刃较钝,与其相对的一端均很平整,便于手握。标本 SYP.1121 是用等腰三角形的燧石片由远端正向加工而成的,尖刃钝,尖刃角 30° ,尖刃的两侧加工精细。该标本长 55 毫米,宽 30 毫米,厚 13 毫米,重 30 克(图 4,7)。标本 SYP.0006,用脉石英石片制成,一侧刃向背面加工,另一侧刃向两面加工。长 39,宽 22,厚 12,重 12 克(图 4,2)。

(3) 雕刻器 2 件,均用燧石残片制作,个体很小,重量在 2 克以下。标本 SYP.0112,屋脊型雕刻器,状如石锥,尖端突出,两侧边亦做了较细的加工修整(图 4,10)。标本 SYP.0021,平面型雕刻器,一侧为劈裂面,另一侧薄锐并有砸击修理的痕迹(图 4,9)。

三、结 语

根据对榆次大发地点石制品的观察,其文化特点可归纳如下:

(1) 石制品原料主要是燧石和石英岩。存在大量的石片。石器多用片状毛坯制作,石片石器占主体地位。

(2) 传统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并存。传统的石器都较细小,细石器中有典型的楔状石核、石叶及小圆头刮削器等。

(3) 石器在打片和加工修理过程中采用了石锤直接打击、砸击和压制三种技术。绝大多数石器只向一面加工。石器形体规则,加工精细匀称,器型稳定,表明其加工制作技术已进入高度稳定发展的阶段。

(4) 器型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虽数量不多但加工精细,雕刻器则少而不典型。

其中数量多、个体小、加工精细而器型稳定的凸刃端刮器, 形成该地点石器工业的鲜明特色。

大发地点是在山西省晋中盆地首次发现的传统的小石器和细石器并存的旧石器地点, 时代属晚更新世末期。比较典型的小石器和细石器遗址或地点在山西雁北地区如朔县峙峪, 晋南地区如下川、蒲县薛关(王向前等, 1983)均有发现, 但两地距离较远。因此, 大发地点的发现对于研究山西南、北两地小石器和细石器的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细石器遗址或地点已经发现多处, 分布范围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河南、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等省、市和自治区。有的学者已经对中国细石器的时空关系和总体特征进行了探讨和总结(贾兰坡, 1978)。近年来, 在华北地区, 特别是山西、河北二省, 新的地点新的材料不断涌现(王向前等, 1982; 王向前等, 1983; 陈哲英等, 1984; 贾文亮等, 1989; 黄骅细石器调查小组, 198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989; 谢飞等, 1989)。随着材料的增加, 必然会有新的问题呈现出来, 致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从目前的资料看, 我国的“细石器文化”是很复杂的, 单就山西和河北这两个地区的情况而言, 虽然象下川和虎头梁(盖培等, 1977)这样材料丰富类型全面的遗址并不很多, 一些地点也缺乏系统的工作, 但透过这些材料, 仍可对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略见一斑。例如在石器的形态与组合方面, 既有典型的细石器工业——即以类型多样的细石核、石叶及典型的细石器工具为主, 以少量打制的非细石器制品为辅的石制品组合(如山西下川遗址, 河北虎头梁遗址、油房遗址), 又有非典型的细石器工业——即以打制的非细石器成份为主体, 以少量细石器制品为辅助的石制品组合(如山西蒲县薛关遗址、怀仁窑子头遗址、榆次大发地点和河北滦县东灰山遗址)。而在这两种情形中, 各遗址或地点的石制品组合又各自显示出自己的风格, 如虎头梁的石制品组合因含有大量的楔状石核和形制规整、加工精细且底端有变异的尖状器、半月形刮削器以及各种装饰品而别具一格; 下川工业则以大量的锥状石核、比例极高而类型多样的刮削器、数量众多的三棱小尖状器以及加工精美的斜边雕刻器而独具特色; 大发地点和东灰山遗址的石器工业表现为细石器与小石器的组合, 而下川遗址、虎头梁遗址等则或多或少包含着砍砸器等粗大石器成分。在技术因素方面, 这些细石器工业无疑都运用了压制或间接打击这些新的制作技术, 但在下川、虎头梁、大发等石器工业中仍保留着从北京猿人时代开始出现的砸击技术产品。窑子头、薛关、油房及东灰山等遗址或地点的石制品组合, 在报道中没有两极石核、两极石片这些砸击技术成份。这些差异说明我国华北的细石器文化(进而推之我国境内的细石器文化)决不是单一的, 而是有所变异, 有所分化的。有的学者已经将“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变体”等概念引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张森水, 1987)。对我国境内各地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存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无疑将是十分有益的, 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必须看到, 尽管存在一些差异, 我国华北细石器文化的共性仍是显而易见的, 最强烈的表现就是楔状石核和小圆头刮削器成为绝大多数遗址或地点石制品组合中最丰富、最稳定的成份。由此可见, 对我国境内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展开区域类型的研究, 并进而在文化渊源、演进、交流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宏观分析, 将有助于使我国细石器文化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1990年6月21日收稿)

参 考 文 献

- 尤玉柱,1989.史前考古埋藏学概论.文物出版社,北京。
- 尤玉柱等,1987.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文物出版社,北京。
- 王向前、丁建平,1982.太原古交石千峰一带的细石器.山西文物,(1): 34—36。
- 王向前、丁建平、陶富海,1983.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2: 162—171。
- 王建、王向前、陈哲英,1978.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3): 259—288。
- 陈哲英、丁来普,1984.山西怀仁窑子头的细石器遗存.史前研究,(4): 63—69。
- 张森水,1987.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天津。
- 张玉萍、黄万坡、汤英俊、计宏祥、尤玉柱、董永生、丁素因、黄学诗、郑家坚,1978.陕西蓝田地区新生界.科学出版社,北京。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89.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考古,(11): 967—970。
- 周信学等,1990.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
- 贾兰坡,1978.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 137—143。
-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1972.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 38—58。
- 贾文亮、王太明、陈哲英,1989.山西榆社岚峪的细石器.文物季刊,(1): 14—17。
- 盖培、卫奇,1977.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 287—300。
- 黄骅细石器调查小组,1989.河北黄骅发现的细石器.考古,(6): 481—488。
- 谢飞、成胜泉,1989.河北阳原油房细石器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8: 59—68。
- 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周明镇、刘宪亭、王择义,1958.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2号,科学出版社,北京。

THE PALEOLITHIC SITE AT DAFU VILLAGE, YUCI DISTRICT, SHANXI PROVINCE

Gao Xing You Yuzhu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100044)

Wu Zhiqing

(Jinzhong Subprovincial St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ntiquities, Yuci 030600)

Key words Dafu; Microlith; Upper pleistocene

Abstract

The Dafu paleolithic site is located at the right bank of Xiaohe River, near Dafu village (112°50'10"E, 37°40'30"N), about 15 KM west to Yuci city, Shanxi province.

The site was found in 1980 and excavated in the same year and the year following. More than one thousand stone artifacts, some few mammalian fossils and numerous broken bone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sand contained gravels layer of the second terrace of Xiaohe River.]

The fossil remains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forms: *Canis lupus*, *Equus przewalskyi*, *Equus hemionus*, *Sus scrofa*, *Megoloceros sp.*, *Bos primigenius*. All of the mammals represented by the above fossils used to liv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during Upper Pleistocene.

The stone artifacts (mainly made of pebbles of flint and quartzite), including paleoliths and microlith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cores, flakes, microcores, microblades, scrapers, points, burins and debris. The major component of the implements are scrapers. The artifacts were flaked and retouched by three methods: direct percussion by a hammerstone, bipolar technique and pressure technique. All of them are very small in size, and most of the tools are very fine in workmanship. The Dafu industry show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iyu site in northern Shanxi and Xiachuan site in southern Shanxi in technology and typology.